

# 彝文古籍 整理与研究

朱崇先 著

民族出版社

YIWEN  
GUJI  
ZHENGLI  
YUYANJIU

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

朱崇先 著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 / 朱崇先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9

(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9576 - 6

I. 彝… II. 朱… III. 彝语—古籍整理—研究—中国 IV. C2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7986 号

## 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

---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010 - 64271909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http://www.mzchs.com>

印 刷：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字 数：410 千字

印 张：15.75 1/32

印 数：0001 - 1500 册

定 价：30.00 元

---

ISBN 978 - 7 - 105 - 09576 - 6/G · 1705 (汉 779)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b>第一章 绪 论</b>	1
<b>第二章 古彝文及其典籍文献研究综论</b>	25
第一节 彝文的起源与称谓问题研究	26
第二节 关于古彝文的性质与类型问题的 讨论	39
第三节 彝文古籍的应用性整理与 学术研究的兴起	51
第四节 彝文古籍整理出版专业化与 学术研究的进展	66
<b>第三章 彝文古籍的地区类型</b>	78
第一节 东部方言区古籍文献诸类型	80
第二节 北部和南部方言区的 古籍文献类型	92
第三节 其他方言或地区的彝文 古籍文献类型	98
<b>第四章 彝文古籍征集与收藏情况述要</b>	104
第一节 彝文古籍文献的传播与收藏	105
第二节 国家图书馆彝文古籍的 征集、收藏与整理	111
第三节 清华大学图书馆古彝文典籍 收藏与整理	119

**第五章 彝文古籍编目、著录与分类法探索 128**

第一节 彝文古籍编目、著录的重要性和  
目录的作用 128

第二节 彝文古籍的著录方法及具体规则 132

第三节 彝文古籍分类法举要与学科  
分类法探讨 142

**第六章 彝文古籍翻译、注释的基本原则  
和方法 160**

第一节 翻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  
对译注者的要求 163

第二节 彝文古籍译注底本的解读与  
校勘 172

第三节 彝文古籍翻译的基本步骤与  
具体方法和技巧 185

第四节 彝文古籍翻译体例和注释方法 189

**第七章 彝族历史典籍与文学作品及文论的  
整理研究 207**

第一节 彝文历史典籍举要 207

第二节 彝文历史著述及其史学意义和  
史料价值 233

第三节 彝文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和价值 242

第四节 古彝文文论的学术研究价值 260

**第八章 彝文医药典籍与天文历法论著的  
整理研究 266**

第一节 彝文医药典籍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 266

第二节 彝文天文历法及其典籍文献  
评价与研究 282

**第九章 彝文宗教经籍和哲学论著的  
整理研究 308**

第一节 彝文宗教经籍综论 308

第二节 彝族传统宗教与彝文宗教经籍的  
学术研究 325

第三节 彝族古老的宇宙观与深奥的  
彝文哲学论著 330

**第十章 彝文古籍整理现代化与文献资源的  
保护及开发利用 349**

第一节 关于彝文古籍整理现代化问题 349

第二节 彝族古籍文献的抢救与保护 359

第三节 彝族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与开发  
利用 366

**The Study of the Yi Language Ancient  
Document 371**

后 记 498

# 第一章 緒論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也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且跨境而居的民族之一。彝族总人口有900多万，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自己古老的民族文字，拥有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在西南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气息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彝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彝文古籍，历经浩劫，仍能够有数以万计的典籍和文书档案留传下来，实属不易。它作为彝族人民的优秀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倍加珍惜。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时间的推移，这一珍贵文化遗产，面临继续遭受自然损毁和种种人为因素而遗失的危险，需要加强抢救和保护。欲使之成为可持续性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当务之急就是对其载体进行科学整理和有效保护，并对其文化内涵加强学术研究。无论进行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出版，还是对文献内涵的梳理和探讨，都要始终把握彝族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脉络，更要熟悉了解彝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风情，也需要关注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进展情况和专业建设、理论探索等方面的问题，切实掌握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提高彝文古籍整理质量和文献内涵的研究水平。也就是说，要始终把彝文古籍整理和研究与整个彝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切从彝学各领域的实际需要出发，及时地为之提供翔实可靠的文献依据，真正地把彝文古籍整理研究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和新文化建设的武库。为此，本章从彝族的地理

分布和生态环境与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丰富多彩的彝文古籍与灿烂辉煌的彝族传统文化、彝文古籍的整理与彝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彝文古籍整理专业化建设与理论探索等几个方面加以概略的论述。

### 一、彝族的地理分布和生态环境与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彝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个省区，以及与我国接壤的中南半岛各国。彝族居住地区横跨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向东延伸，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既有崇山峻岭，又有宽广的山间河谷坝子，还有众多的江河湖泊。光热条件优越，气候冬暖夏热，属亚热带立体气候，从高山到河谷，分布着寒带、温带、亚热带气候，有的河谷四季炎热，而有的高山却终年积雪，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在园艺农业方面有极大的发展前景。原始森林广阔，有团花、滇金丝猴、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和鹿茸、麝香、熊胆、茯苓、三七等名贵中药材。有众多的草山、草坡和草坪，草场面积较为宽广，畜牧条件甚佳。彝族地区农耕畜牧并重的历史悠久，发展畜牧业有很大潜力。流经川滇彝族地区的金沙江及其支流，蕴藏着巨大的水利资源。彝族地区是我国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的主要产区，铜、铁、铝、锰、锡、铅、锌等数十种金属的储藏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攀西地区是矿藏的“聚宝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个旧市为“锡都”，黔西的六盘水市为“煤城”。这里地质结构复杂多样，在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地面则呈现出石林、土林、瀑布、溶洞等众多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成为“矿产王国”与观光游览的奇妙世界。彝族地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既对人类的进化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各种文明的创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曾是古生物的乐园和古人类的摇篮。如1亿多年前的禄丰恐龙及众多的古脊椎动物和1000多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就

在这里栖息，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也在这里生活。仅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考古工作者已在元谋盆地发掘了下棋柳、大能禹、骂龙村、新村等八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和大那乌中石器文化遗址，与此同时，在元谋及禄丰、南华、大姚、姚安、牟定、永仁、武定等地发现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及新石器时代的石棺墓葬群。这众多不同的文化遗存，反映了史前人类的进化发展过程。有史以来，诸多的古氏族部落在此活动，如百濮系统和氐羌系统以及百越系统的一些氏族部落曾在这里互相接触、融合、分化，除了形成当今西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之外，很大一部分先后融入汉族之中。由此可见，彝族居住的西南地区是亚洲人类的重要发祥地，又是古代多元文化的聚散地和分合点。它作为多重文化的积淀区，是我们探索人类奥秘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圣地。

彝族是西南土著部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南下的古羌人以及周边其他部落和外来人群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约在四五千年前，分布在陕、甘、青一带的古羌人就开始南下。到了西汉，羌人的一支与西南地区的土著部落融合，形成彝族先民——西南夷，其后不断有外来人群加入到这一民族共同体。据新发现的彝族古籍《夜郎史传》记载，西汉时候的夜郎国由彝族先民建立。汉至六朝，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分布着被称为“叟人”的彝族先民，并建立了诸多地方王国。如：川西南的“邛都”，滇东北的“滂浸”、“靡摩”、“自杞”，滇池地区的“滇”等地方王国。彝族形成民族共同体之后，活动范围大体保持在我国的云、贵、川、桂四省区，并有一部分跨国分布于与中国比邻的中南半岛各国。各地彝族都有始祖“笃慕”的传说，据传世较完整的水西安氏谱系计算，从“笃慕”至清康熙初年的安胜祖已经历了85代，约可上溯至战国前期。“笃慕”所生六子分别成为彝族六大部落各部的祖先。史称“六祖”。六祖的后裔从发祥地“滋兹普乌”（今昭通一带）向外迁徙，繁衍成各地彝族。彝族历史较早地出现游牧

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产生了兹（君）、莫（臣）、毕（师）、革（匠）、卓（民）五种社会分工，并逐渐形成五个等级的分化。其中兹、莫、毕成为统治者，革、卓沦为被统治者。彝文著作则有“六祖”畜牧部落征服濮人农业部落的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地彝族先民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在征服当地诸多土著部落的基础上，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制的过渡。到了唐代彝族先民在西南地区的势力日益强大，约8世纪30年代，彝族“蒙舍部落”首领皮罗阁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族、纳西族等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南诏不断向唐王朝称臣纳贡，有10个王受到唐王朝的委任和册封，曾两度和唐皇廷议婚，并且缔结了舅甥关系，立誓“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南诏统一时期，云南各少数民族人民与中原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天复二年（902年），南诏覆灭。两宋时期，大理段氏政权，在彝族地区依靠部落首领统治其属民，号称“东方三十七部”，段氏与之会盟史称“三十七部会盟”。而四川的戎（宜宾）、沪（泸县）、黎（汉源）三州的彝族先民，则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之间，出现了强大部落，部落统治者史称“鬼主”。贵州彝族建立的罗施鬼国和罗甸国在宋代也是较强大的地方政权。1253年，元军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元联合，并有“罗罗”的统一族称。元朝在彝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1263—1278年，相继在今云南的开远、武定、楚雄、大姚、建水、昭通、东川；四川的越西、西昌、屏山；贵州的大方、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根据彝族部落酋长的领地和管辖范围，册封宣慰司、宣抚使、土官总管府、土官知府等官衙。在元代的近百年间，由于战争与自然灾害频繁，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从繁荣转向日趋凋零。在明代的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布（镇

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属于奴隶制性质。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土司、土目以及奴隶主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部分地区由此逐步向封建制过渡。总的说来，彝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彝族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云南、贵州的广大彝区与全国的社会发展基本一致，在彝族上层集团内部开始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而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的彝族处在奴隶制阶段，云南红河南岸地区和滇东北部分地区的彝族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很少的一部分彝族地区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sup>①</sup> 彝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族内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保留着多重社会形态和不同文化类型，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与分析研究提供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活化石，对系统、全面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具有典型意义。

## 二、丰富多彩的彝文古籍与灿烂辉煌的彝族传统文化

由于彝族先民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较早地创制和使用本民族文字，并广泛地应用于文献记录和著书立说，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为我们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在彝族古籍文献中作了系统的记录和全面的著述，为研究本民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提供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史资料。

在彝族辉煌的传统文化及其内容丰富多彩的彝文典籍中，包含

---

<sup>①</sup> 陈贤君：《中国彝族通史纲要》，第26—223页，昆明，云南省民族出版社，1993。

着独特的天文历法知识和丰富的天文学文献。彝族先民在长期从事畜牧与农耕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极探索宇宙奥秘，注重对天象与季节变化的观察，为了系统全面地掌握自然规律，不但对已知的各种知识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而且对种种未知的事物和自然现象进行积极的探索。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并创立了本民族的历法系统，形成独具特色的天文学体系和历算方法。彝族曾经使用过两套具有典型意义的历法系统，即：“十月太阳历”和“十八月太阳历”。前者将一年分为 10 个月，一月为 36 天，年末剩余的五至六天作“过年日”。过年日通常为五天，每隔三至四年增加一日为六日。平均每年为 365.2422 日，与太阳回归年接近。“十月太阳历”以十二属相纪日（各地十二生肖的畜兽有所不同），一月为 3 个属相周，一年正好 30 个属相周，一年又分为五季，每季两个月，双月为雌，单月为雄。此历法以太阳运动定冬夏，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定寒暑。后者把一年分为 18 个月，每月 20 天，全年 360 天，年末剩余的五天作过年日。18 个月的名称顺序是：吹风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天朝月、虫出月、雨水月、生草月、鸟窝月、河涨月、虫鸣月、天晴月、无虫月、草枯月、叶落月、霜临月、过节月。一月 20 天的名称顺序是：开天日、辟地日、男子开天日、女子辟地日、天黑日、天红日、天紫日、火烧天日、水冷日、洪水日、葫芦日、伏秦皇帝日、伏益姐妹日、寻觅人口、野蜂日、蜜蜂日、出入日、天窄日、地宽日、地缩日。近代，大部分彝族地区使用汉族的农历，传统的火把节逐渐固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星回节”即“彝族新年”的日期，从农历十月至正月很不统一，这是彝族传统历法受到农历影响而产生的变异。然而，在部分彝族地区至今还使用上述历法。在著名的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和《宇宙人文论》两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彝族天文历法；近年还发现用彝文编著的古代天文学典籍。民间观测季节变化，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山头为坐标，定点察看太阳升起

时的南北移动位置，当太阳达到最南点为冬至，太阳达到最北点为夏至。另一种是观测北斗星的运行，傍晚星斗初现时，斗柄上指为大暑，此时过火把节；斗柄下指为大寒，此时过星回节，即十一年。另有“三石法”、“墙洞法”等。彝族还有“物候定农”的传统，故彝谚云：“听见布谷叫，应该种地了；听见蝉儿鸣，该锄二道草；听见金针叫，开镰收割好；听见乌鸦叫，天寒地冻了。”《西南彝志》记载：“树木开花时，就叫春三月；树木花谢时，就叫夏三月；树果成熟时，就叫秋三月；树叶枯降时，就叫冬三月。”彝族划分时段也很有特点，有的将一天分为十一个时段：鸡叫时、天微明时、天大亮时、放牲口时、日当顶时、太阳偏西时、收牧时、黄昏时、入睡时、深夜时。也有的把一天分为八个时段：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黄昏、半夜、鸡叫时。彝族的二十八星宿占法也别具一格，其星座也有特殊的名称。如鹦鹉头、鹦鹉翅、鹦鹉腰、鹦鹉尾、熊胸、熊背、公熊神、母熊神等。总而言之，彝族的天文历法体系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

在彝文典籍中，宗教经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内容除了宗教文化之外，广泛涉及彝族世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彝族的宗教而言，也有其自身的突出特点，对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心理反映、信仰崇拜等发展轨迹的考察具有典型意义。彝族信奉的传统宗教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多神教，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这种宗教观念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受神灵的主宰，人的一切活动具受神力的支配。因此，只有虔诚地信仰和祀奉各种神灵，才能安居乐业。在各种活动中难免冲撞和触犯某些神灵，也时常会遭受一些鬼怪的伤害和纠缠。这就需要祈祷神灵保佑和宽恕及驱赶鬼怪、解除冤孽。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宗教法事以及祭祖仪式和各种占卜与巫术活动。彝族过去主持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分别称之为“呗耄”或“毕摩”与“纳尼”或“苏里”。前者掌握彝文宗教经典，主持各种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

有特制的服装和法器，是彝族的宗教领袖，肩负宣扬和传播彝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古代多为世袭制，父子相传，有严密的等级观念。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低落，家学外传、收徒授业之风日盛。后者如同北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萨满”，类似于汉族的“端公”、“师娘”。从事巫术活动，不需要专门学习。认为原来作“纳尼”的人死后，纳尼神灵可以随时附在某人身上，使其疯癫发狂，处于精神病状态，充当纳尼神灵的代言人。在纳尼神灵附体时，家人愿意让他作“纳尼”，可以举行拜师仪式。病愈后，需要作法时，举行请神仪式，纳尼神灵就会降临，助其作法；如果不愿意作“纳尼”，可以举行祭祖仪式，请纳尼神灵离开病人，另找继承人。“纳尼”虽为人们所需要，但社会地位并不高。在彝族宗教观念中，祖先崇拜为首要。超度祖先亡灵，使其化为家神保佑全家平安，继而举行氏族公祭，把家中供奉数代的祖灵移至氏族祠堂——祖先岩洞，意即让祖灵与本氏族其他祖灵共同升迁为氏族保护神。这一观念反映了彝族祖先崇拜中的近祖崇拜与远祖崇拜两种形式及其目的和意义。在彝族灵魂观念中，有“三魂说”和“两魂说”。前者认为：人有三个魂，一称“寅益”主聪明才智；二称“焦益”主运动行走；三称“翁益”主躯体容貌。人死后“翁益”守坟茔，“寅益”居家堂，“焦益”赴祖先发祥地。后者认为：人有两个魂，男人和女人的灵魂也有区别。男人的灵魂：一个叫“衣那”，附于人体，保佑健康；另一个叫“曲谢”，跟随人左右，保佑成功发财，被视为男人的财神。女人的第一个灵魂与男人相同，也叫“衣那”；第二个则叫“格非”，跟随人左右，保佑生育，被视为女人的生育神。在彝族传统宗教的思想体系中，虽然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成分，但是也渗透了一些佛教、道教等的思想内容，也受到彝族社会变迁等诸因素的影响。因此，彝族传统宗教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其间已注入了许多人为的迷信成分。故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准宗教。虽然，自唐朝以来，部分彝族开始接受佛教和道教；西方基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有些彝族又去信仰基督教。但是，彝族传统宗教始终在本民族中占主导地位。

彝文古籍文献中不仅有体裁多样、题材广泛的文艺作品，还有学术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著作。彝族的文学艺术在整个彝族文化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彝族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极其辉煌，不但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学、绘画及歌舞、音乐等文艺作品，而且具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体系。以彝族文学而论，其保存、传播的形式与目前尚存的这批文学典籍、论著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即：用老彝文写成和用汉文写成的书面文学及用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这三类文学作品中，民间文学最引人注目。因为，彝族民间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彝族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深深地植根于彝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认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的宝贵材料。彝族民间文学，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形式齐备，包括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叙事诗、谚语、格言、寓言、童话等。特别是彝族的民间文学，在口耳相传的同时，多数作品被辑录于文献典籍之中，形成彝族民间文学口头流传与书面传播并行的局面。无论是口头流传的，还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都深受彝族人民欢迎。彝族的文艺理论，全面系统地归纳和总结出创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这方面的论著有《彝族诗律论》、《彝族诗文论》、《论历史和诗歌的写法》等。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各种歌舞常有音乐伴奏。古代村社设有固定的歌舞场所，彝语谓之 [b a<sup>33</sup> dzo] “伴绞”（眷恋场）。举行各种集会、庆典，大多以歌舞助兴，就是在丧礼上，也要载歌载舞。彝族地区的《南诏奉圣乐》（夷中歌曲），早在唐代就到中原表演。彝族民歌种类颇多，大致可分为叙事歌、情歌、苦歌、劳动歌、儿歌、风俗歌、婚礼歌、丧礼歌、宗教祭祖歌等。乐器有牛角胡琴、四胡、巴乌、马布、葫芦笙、大三弦、铜鼓、克谢觉黑、笛老挪、彝箫、非里、口弦、叶笛、布里拉、克拉蒙等。乐曲有独奏曲、合

奏曲、舞曲等。彝族舞蹈既可分为歌舞和乐舞，也可合二为一。彝族歌舞，又称“打歌”或“踏歌”，历史十分悠久，可上溯至唐代以前，尚有南诏时代的踏歌图和诸多地方志的记载为证。这一传统的民族歌舞至今广泛流行于各地彝族地区，只是其名称因地而异，分别被称之为“打跳”、“左脚舞”、“跳歌”、“跳芦笙”、“阿乖乐”、“锅庄舞”等。除此之外，还有“四弦舞”、“乐作舞”、“朵洛荷舞”等乐舞和各种“仪式舞”。这类传统舞蹈及其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给彝族人民带来欢快和愉悦。在彝文古籍中有着丰富多彩的彩色插图，也有不少图文并茂的图书，各种花鸟画、人物画、鬼神画、自然风景画，都画得生动逼真，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彝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畜牧与农业并重，并且注重金属冶炼和器物、工具铸造以及熬制食盐的历史相当悠久，各种生产劳动经验和工艺技术，多有文献记录。彝族曾经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建立过诸多大小王国，形成宗教习俗、医药科学、天文历法、哲学观念、礼仪制度等一套十分完备的文化体系，分别用本民族文字予以记载，并留下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

### 三、彝文古籍的整理与彝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彝族传统文化与彝文典籍的学术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彝族及其文化就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进行社会调查和人类学考察研究的重要对象。从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许多西方人先后深入彝区，调查彝族社会历史与风情民俗，搜集彝文典籍。他们在彝族地区获得人文、自然、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并将其搜集到的一大批彝文典籍和有关资料，运回各自的国家，分藏于多个图书馆。在此期间，彝文典籍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有一些很有影响的论著先后问世，如《华西的倮字》、《倮倮及其韪书》、《云南倮倮文研究》、《倮语研究论文集》等；先后出现了一些在彝族语言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的学者，如法国人亨利·科尔迪埃、美国学者哈里·伏兰克、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等。保禄·维亚尔，虽为传教士，但对彝族的社会历史与语言文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彝文典籍的整理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把彝文原著翻译为法文之后，以彝文和法文对照形式公开出版。著有《宇宙源流》、《大地起源》、《洪水泛滥》、《倮倮的历史·宗教·习俗·语言文字》、《云南彝族文字研究》、《彝语语法》、《法倮字典》等书。为当时的彝族文化研究和让国内外学术界了解彝族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文献依据。鉴于他的学术成就，法国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20世纪初开始，彝文典籍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如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受原中央研究院和广州中山大学之派遣，前往西南彝区从事民族调查。他在深入彝村山寨的田野考察中，特别注重彝文典籍的搜集与研究。著有《云南罗罗的文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罗文起源及其一般内容》和翻译注释的《彝文〈十二生肖经〉对译》。他的学术成就对后来的彝文典籍和彝族传统文化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他之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趁地质调查工作之余，也从事彝文典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他先后收集若干部彝文典籍和碑铭，邀请彝文经师罗文笔先生把部分经书翻译为彝汉文对照，并用字母注音的四行体译本，为彝汉文对照科学本开创了先例。他主编的这部彝文与汉文合璧的巨著——《彝文丛刻》成为现当代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中采用的科学译注文本的范本。

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国际学术研究环境恶化，必然影响到对彝族文化的学术研究。在国外对彝族文化的考察和学术研究走向低谷，国内对彝族传统文化和彝文典籍的学术研究则出现新的转机。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彝区成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和坚强的民主堡垒。于是北京、天津等地的